

657

湖北人物 传记

(试写本第三辑)

湖北省志·人物志编辑室编

1983.7

编 印 说 明

一、为了做好省人物志的编纂工作，我们以试写本形式分辑编印传记部分，以便广泛征求意见，逐步积累成果，争取三五年内完成传记试写任务。我们期望，试写本的编印，将促进社会各方面对人物志作用和意义的认识，主动积极地担负起各自地区、战线、部门人物传记的写作任务。

二、人物收录时限、范围，暂定在一八四〇年以来，籍隶湖北或在湖北长期工作且有重要影响的外省及外国籍各类人物，而以推动社会前进的正面人物为主。在编排上暂按清末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军政人物和经济文化等其他人物这样三个方面，并就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参照登上历史舞台的先后进行排列，不具有正式体例的意义。

三、在方志人物传记写作方面，我们试图以两三千字的篇幅来概括一个人物一生的主要方面，并体现人物的特色。实践是初步的，尚不具有“样品”的意义。

四、为了录以备，我们在选用稿件时，标准稍微放宽了一点，因而，所收传记不都是正式编纂时一定要采用的。

五、真实，是使历史记载传之久远、跻于史册之林的基础。由于所录人物来自各个时期、各个社会领域，由于近现代社会变革发展的剧烈迅猛，在史料的完备和可靠性上存在着不足，请有关方面、学术团体、知情人士对本辑传记提出订正和补充意见。

六、撰写一篇概括人物一生及其主要言行的传记，是一件相当费时费力的工作。本辑所收传记，有不少是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作者走遍大江南北，采访百十人次，历时数月、数年、甚至

几十年才得以成稿，每字每句凝结着作者、知情者、提供史料机构以及有关单位的共同劳动，在辑编印之际，特一并致以谢忱。

七、限于能力和经验，本辑传记在体例、内容、文字以及编排上，错误在所不免，热情盼望有关方面、革命前辈，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湖北省志·人物志编辑室

1983.7.

目 录

柯功伟	张以来	(1)
何羽道	何秉冲	(8)
杨学诚	黄陂县志办	(13)
李求实	虞崇胜 李良明 田子渝	(16)
林祥谦	禹玉临	(20)
陶静轩	朱敬楨	(24)
孟昭亮	唐昌泰 涂福星	(30)
柳真吾	桂遇秋	(34)
彭之玉	江陵县志办	(37)
宛希先	王乐俊 桂遇秋 陆登霞	(41)
肖云鹤	王恩炳	(44)
耿 丹	刘厚忠	(48)
杨 威	襄阳县志办	(51)
沈德纯	柴怀山	(54)
张 敏	吴有清	(58)
陈相波	江陵县志办	(60)
罗四维	张双勤	(63)
雷鸣泽	张圣泉	(65)
胡亮寅	张双勤	(68)
杨海东	吴德才	(71)
雷桂花	吴德才	(73)
陈年振、陈宗瑜 (合传)	龚光美 杨尚成	(75)
周念民	潘顺福 苏绍振	(78)

黄兴武	咸丰县党史办	(81)
涂美中	群力	(83)
黄纯一	钟细望	(86)
桂林栖	陆登霞	(89)
曹玉阶	李新福	(92)
涂云庵	陈玉祥	(94)
吴先英	傅玉松 向汉章	(97)
王卫民	李宗润	(100)
朱仁义	张念桥	(102)
朱小春	陈其福	(104)
张难先	傅献瑞	(106)
李西屏	方修胜	(112)
梁钟汉	吴道义 高鹏	(116)
吴兆麟	张祥麟	(123)
宛思演	陆登霞	(125)
韩大载	张胜泉	(127)
樊耀南	樊明孝 唐昌泰 涂福星	(131)
赵德全	张祥麟	(134)
王世杰	崇阳县志办	(137)
何成潜	随县县志办	(141)
夏斗寅	万启宇	(145)
彭介石	随县县志办	(148)
李四光	王恩炳	(150)
吴伯藩	董品	(157)
陈泽荣	唐昌泰 涂福星	(159)
杨济芳	唐昌泰 涂福星	(163)

陈雨苍	张洪新 游金斌(166)
蒋玉伯	杜清道(170)
吴藻溪	崇阳县志办(172)
葛痴佛	胡华林 张绳武(175)
秦观楼	随县县志办(178)
余海先	陆登霞(181)
王运孚	胡远怀(185)
杨格非	省宗教志办公室(187)

何 功 伟

何功伟（1915—1941），字超寰，又名何彬、何斌、何伟、何明理。咸宁县柏墩乡中田畈人。出身地主家庭。幼读私塾，沉静好学，进取心强，受蒙师、乡农协委员王寿桥进步思想影响，从小就同情贫苦农民，见不得压迫人的事。在同学中，如遇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事，总是站在弱小者一边，据理抗争。

一九二六年八月，北伐军进入咸宁，在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援下，于汀泗桥、贺胜桥全歼吴佩孚主力。咸宁各界群情沸腾，举行万人庆祝大会。当时功伟在县高等小学读书，也参加了庆祝活动。他常与同学唱道：“南兵好，北兵坏，坏上加坏吴大帅，南兵一来垮得快。”并说：“我长大了也要拿枪打军阀。”

翌年，咸宁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其父为了“避风”，带他远走上海。半年后，他随父返汉定居，就读于武昌阅马场省立第四小学。他看到许多革命者在反动派的屠刀下壮烈牺牲，想到民族英雄被奸臣陷害，心中非常气愤。常用手抠掉书本上奸臣败类的名字。立志要象梁山英雄那样“杀富济贫，除暴安民”，铲除人间不平。

一九三〇年春，功伟考入省立二中。次年发生“九·一八”事变。东北大好河山陷入敌手。他满腔义愤，积极组织同学参加“抗敌后援会”，批驳《田中奏折》，发动民众奋起抗日，救亡图存。一九三三年秋，他以全省初中毕业会考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入湖北省高级中学。为了寻求救国真理，他常到汉口生活书店阅读及购买进步书刊，进而结识了顾一凡等进步青年，参加了“读书会”。从此，他开始研读马列著作，接受党的教育。他严格要求自己，坚持穿粗布衣，参加体力劳动和体育锻炼。假期回家常

教育他妹妹要“吃自己的饭，留自己的汗；靠人、靠天、靠祖宗算不得好汉！”他在家还经常与父亲辩论说：“国民党对外卖国，对内害民，不得人心，将来肯定是共产党的天下。”

一九三五年，北平“一二·九”运动爆发，功伟组织省高学生奋起响应，并与陈述元等联络六十多所学校，于十二月十七日成立了“武汉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武汉学联”），被选为常务干事会纠察干事。次日，他在学联召开的大会上强调指出：“武汉青年也要成为爱国的先锋。为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生存，牺牲了也是光荣的。”二十日，他胸佩“总纠察”符号，率领武昌两万多名学生示威游行。武汉国民党当局惊恐万状，急令停开轮渡，阻挠他们过江。功伟当机立断，指挥队伍到建设厅，要求恢复轮渡。在遭到无理拒绝后，学生愤而砸了建设厅的门窗玻璃。厅长刘寿朋被吓得无处藏匿。“学联”主席、复兴社骨干分子许升阶见势不妙，临阵脱逃。功伟挺身而出，领导运动，率万余人顶寒风、抗霜冻，卧断长街，通宵达旦。次日，又率代表入省谈判，终于取得胜利。遂过江，指挥武汉三镇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和市民大会，队伍长达四里，夹道观看者十余万人。其父闻讯，把他叫去训斥道：“你们这些伢崽，不安分守己，到处闹事，抗日有蒋委员长，用不着你们管！”功伟气愤地说：“蒋委员长他就是不抗日，我们才这样搞！”其父后向亲友叹曰：“此儿太痴，似欲将中华民国荷于其一人肩膀上者！”

一九三六年四月，武汉警备司令部奉行政院命令，以“受共产党操纵，反对党国”的罪名，强令解散了武汉学联。为了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扩大抗日救亡宣传，功伟与陈述元、姚树森等发起组织了“武汉学生救国团”。六月，“两广事变”发生，他又与进步同学一道组织“反对内战救国会”，呼吁全国同胞“一致奋起，反对一切内战，团结抗日！”结果遭反动政府镇压，他

被迫弃学，潜往上海。

到沪后，在钱亦石的帮助下，他化名何明理，参加全国学联工作。同年八月，经胡乔木、唐守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党派他进正风中学、暨南大学和法政学院学习，秘密进行党的活动。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他化名何彬，任上海青年救国服务团组织部长，领导爱国青年，冒着枪林弹雨，积极支援抗日。十一月，党又派他率领“内地工作队”一百多名青年转移到武汉。后任省工委委员，分管农委工作，并经董必武推荐，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秘书，次年二月，他调任武昌区委书记，迅速恢复和建立了基层党组织，成立了工人特别支部，并从产业工人中挑选了六百余人到延安学习。五月，湖北省委成立，被选为委员。

一九三八年七月六日，功伟受党派遣回到咸宁，开辟鄂南抗日根据地，重建党的组织。当天，他就在柏墩参加了学生组织“扶摇社”的年会，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无能，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十大纲领。并组织“扶摇社”青年在柏墩街、大屋雷、山南畈等地办起了图书阅览室和民众夜校。八月十五日，又在辅兴街成立了“咸宁学生战时工作团”，并迅速与共产党员黄全法、潘继汉、林平等接上了关系，组建了“咸宁中心县委”，后又按省委决定改为“鄂南特委”，他任书记。

在鄂南工作期间，功伟十分重视抓好党的组织建设和抗日武装建设。他亲自培养了何功国、何功济等许多爱国青年入党，组建了中共柏墩支部。仅两个月时间，就在咸宁县建立了四个区委，发展党员二百多人。不到半年，鄂南十县除嘉鱼县外，都恢复和建立了党的组织。他先后在柏墩举办了两期党员训练班，对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和革命气节教育，要求每个党员“万一被捕，打掉牙齿也不能透露一个字的机密”。与此同时，他积极发动各县群众成立抗日自卫队，并多次亲自上门，动员咸宁名绅何襄祺

一致抗日，终于使何寰楨翻然省悟，共同组织了一支名为“湘鄂赣游击总指挥部直属咸宁第二大队”约三百人枪的抗日武装。十一月初，他们抓住战机，在挂榜山伏击了日寇一支小分队，打响了鄂南人民抗日的第一枪。

年底，国民党反动派在鄂南掀起了反共恶浪，制造了一系列的流血事件，何寰楨被害，特委与省委失掉了联系。功伟及时主持召开了鄂南中心县委扩大会议，认真学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文件，总结经验教训，作出了加强党在鄂南工作的各项决定。并亲自到梁湖、樊湖等地加紧组织抗日武装，开辟地下交通线，使鄂南抗日武装又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平江惨案”后，鄂南地区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也达到了高潮。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功伟根据形势变化及时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转入隐蔽斗争。他组织党员分头撤退、隐蔽后，只身前往江北找党。八月，他辗转到达重庆，向南方局写了《鄂南工作情况报告》。九月，被选为湘鄂西区党委宣传部长。其时，国民党党、政、军、特务纷纷困集鄂西。为了应付突然事变，他在绪区党委起草的《革命气节教育提纲》中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及当前的任务，要求每个党员的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要坚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定性，严格遵守党纪，保守党的秘密。如果被捕，在监狱和法庭上也要坚持斗争，直到牺牲自己的生命，决不能叛党。”

次年二月，钱瑛调到南方局后，功伟代理湘鄂西区党委书记。不久，日寇进攻宜昌，他组织区党委安全撤退，经巴东至恩施，就任鄂西特委书记。他针对鄂西特委前段工作中忽视发动农民的倾向，严肃指出：“要巩固我们党的工作，必须把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并说“农民是我们的基本力量，知识分子是桥梁。”

从而使特委的工作重点迅速由城镇转移到了乡村，促进了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的贯彻落实。

一九四一年一月，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在恩施成立了特务机构——“恩施高干会”，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南方局和特委的同志得知功伟曾被特务盯梢，多次催他转移，他总是回答说：“等我把这里的任务完成以后再说吧。”结果，因叛徒告密，于当月二十日被捕。

在狱中，敌人对他多次进行残酷审讯。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并义正词严地指出，我们党的原则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我们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都是光明磊落，符合人民利益的”。他痛斥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抗日爱国者，是违背《抗战建国纲领》、破坏团结抗日的非法行为。敌人恼羞成怒，把他押到方家坝集中营，囚于漆黑的谷仓之中。功伟当即提出抗议，并进行绝食斗争，终于迫使敌人给他开了一个五寸见方的窗口，还送来了书籍和笔墨等学习用具。他以顽强的毅力和不屈的精神，创作了《汨罗怨》、《狱中歌声》、《奴隶恋歌》等歌词，激励难友们共同奋斗。

陈诚见功伟才华出众，气宇非凡，惊叹“此人伟大”，命令部下“以礼服之，以情动之”。于是，国民党省党部主任苗培成、省府委员刘叔模、省民政厅长朱怀冰及特务头子刘培初等，先后用种种花言巧语劝他“转向”，都遭到了他无情的揭露和驳斥。陈诚无奈，便亲自出马说：“吾爱君之才，只要你交待关系，登报声明脱党，我以人格保你。如君愿意在政界干事，可得省府厅长之职；若愿在军队效劳，可得师长之衔。”功伟不屑一顾，嗤之以鼻。

陈诚不甘失败，电谕藕池驻军，派人前往石首县调关，迫使其父到恩施劝降。功伟闻讯，立即写信劝父说：“当局千方百计

计促儿转向，用心亦良苦矣，而奈儿献身真理，早具决心。苟义之所在，纵刀锯斧钺加诸颈项，父母兄弟环泣于前，此心亦万不可动，此志亦万不可移。……惟愿大人移所爱儿者以爱天下无数万人之儿女，以爱抗战死难烈士之遗孤，以爱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之难童。”不久，其父按陈诚旨意赶到恩施，再三对功伟苦苦哀求说：“陈主席说了，只要你点个头，不再做共产党的事就可以跟我一道出去。”功伟斩钉截铁地回答：“头可断，不可点，你不要再说了！”

最后，敌人无计可施，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在方家坝后山秘密将他杀害，牺牲时，年仅二十六岁。

功伟牺牲的噩耗传到重庆，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负责人深感痛惜。周恩来宣读了他的遗书，多次称赞他是“党的好儿子”，号召向他学习。

一九四二年六月七日，冯文彬、博古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延安各界七百余人为他举行了追悼会，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年工作委员会和徐特立等都送了花圈、挽联。“青委”的挽联上写着“努力解放事业而遭杀害乃整个民族创痛，坚持革命立场至于殉节是全体青年楷模。”

一九五二年，中共恩施地委将其遗骨移葬于五峰山烈士陵园。

（威宁县志办 张以来）

主要资料来源

- 1、《楚晖》第一辑：《何功伟》。
- 2、《战斗在鄂豫边区》第二辑：《开路先锋》。
- 3、《鄂南抗日战争史》。
- 4、《鄂南革命斗争史选编》：《何功伟同志在鄂南》。

5、《武汉文史资料》第三辑：《碧血千秋照清江——忆何功伟在鄂西》。

6、《华师学报》第294期：《何功伟在狱中斗争片断》。

7、1951年7月1日《湖北日报》：《宁死不屈之何斌烈士》。

8、1961年6月22日《恩施报》：《何功伟生平简介》、《何功伟、刘惠馨在狱中的斗争》、《精神永在》。

9、1962年11月22日《湖北日报》：《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何功伟同志》。

10、1982年7月10日《湖北日报》：《一代青年的楷模》。

11、《湖北文史资料》第六辑：《武汉一二·九运动及其前后的回忆》。

12、何楚璩笔记。吴培根、何惠文《何功伟诗文浅注》。

13、钱远铎、雷同、罗源善、胡恪恭及家乡老人何道三、何立俊、何安寿、何建廷等口碑资料。

何 羽 道

何羽道（1882—1928），字翼人，乳名金榜，原名远耀，曾用名苍皋、胡文卿。出生于湖北省汉川县南河渡兰家岭一个贫苦农家。其祖父认定家庭屡遭不幸是由于世无读书人，盼他将来能金榜题名，光宗耀祖，而以“金榜”为其命名；并下狠心叫其父弃农，去操持时人所不齿的屠户营生，渐有积蓄，使其得进塾堂习读经书典籍。十八岁时取得秀才功名，但不满农村贫富不均的状况，而晓示家人，无意作“人上人”。径自挑着行李，去汉阳府中学前堂就读。以后，又入武昌省立文普通学堂。

新学堂的教育，开拓了他的眼界；列强对中国的瓜分，萌发了他的民族意识。他在舆地笔记里强调：“中国情形，民族必归于自治。”在师生大会上讲演，提出“怕革命不能救亡图存”的主张。并受“保障民权，羽翼人道”之意启迪，更名羽道、翼人，自励终身。

一九〇六年，何羽道怀着寻求近代先进知识的强烈欲望，以突出成绩获官费生资格，选拔入东京帝国大学，潜心于法科、经济学科的学习。这时期，他参加了同盟会，成为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

一九一二年，何羽道受武昌首义感召归国，在武昌民政长公署服务。可是民国初建，政治腐败照旧。何羽道也因检举、揭发贪污案而受打击。失望之下，复去日继续学业，以图教育救国。第二年，武昌省立文普通中学堂的校友宋教仁遇刺，更坚定了何羽道教育救国的信念。

一九一七年，何羽道学成回国，定居武昌，先后在国立高等商业专门学校和湖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担任经济学教授，主持经

济学教材的编写，讲解经济学货币论、银行论及宪法等课程，并在私立中华大学教授日文。平时，他在学生心目中，是位平易近人“爱生如子”的师长；课堂上，却是慷慨激昂鞭笞旧世界的猛士，他随时揭露、不断论证了中国经济不能自主的祸根，在于军阀的割据、专横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学生受到爱国主义教育。他从而赢得了学界钦仰，成为武昌地区的知名教授。欲和他交往的人很多，何羽道则有自己的选友标准。如商大校长屈佩兰原本倚重他，他却在校务会上揭穿校长盘剥教职员薪金的丑行；而对比自己年轻的董必武、陈谭秋等革命前驱，表示了特别的推重。

一九二一年，湖北驱逐督军王占元的运动，结局是换汤不换药。继任的肖耀南一手制造了一九二三年的“二·七”惨案，毕业于省法政专门学校的施洋律师也被野蛮杀害。这一切使何羽道认识到，军阀政府不推翻，“教育救国”终将只是泡影。一九二四年，迎来了第一次国共合作高潮，他写下了这样的诗章：“庭中有奇树，不支亦不蔓；众树如参差，此独精神健。一朝风雨来，孤挺复何憾；或将大厦支，或以栋梁建。”“冉冉孤生竹，不比凡花草；葛陂已化龙，庭中栖凤好。愿乃在山阿，风霜经历饱；挺挺忠臣节，凛凛烈士抱。”准备作暴风雨中的参天大树。一九二五年，共产党人董必武、陈谭秋组织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秘密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何羽道参加了省党部的工作，并一度与李汉俊、邓初民当选为常务委员，领导湖北人民群众进行反对直系军阀统治的斗争，为迎接国民革命军的到来，打下了可依赖的群众基础。

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攻占武昌，省党部和北伐军政治部进驻阅马场红楼。此时，国民党内部正围绕迁都去向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并入国立武昌大学任教的何羽道坚决支持党内左派的意见，拥护迁都武汉，反对蒋介石定都南昌的阴谋。由于何羽道毕竟为教育界老人，蒋介石、汪精卫并未对他多加防范，因此

在以后分共之始，未将他列入通缉名单，而中共对他愈加信赖。一九二七年一月省党部召开全省代表大会，他再次被举为常务委员，另两名常委则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董必武和钱亦石。分工何羽道主管财政和常驻党部办公。他亟思图治经济改革，然而武汉政府时期的政出多门，使他的理想难以实现，他大量的时间只是耗费在日常事务，诸如接待来访人员、处置公文上。每天上午七时半就徒步来到阅马场红楼省党部，回家则在下午五时半以后，甚至七、八点钟。为了培养工农运动干部，以省党部和省政府名义办了省党务干部学校、党义研究所和文官养成所等学校，他是积极的赞助者和热心的兼职教员，并亲任文官养成所所长。毛泽东创办的武昌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建立后，何羽道也是热心的兼职教员之一，负责讲授经济学常识的课程。这几所红色学校的学员，后来在各县党政机构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作为省党部的主要负责人，他想到的总是别人。为了让机关里的勤杂人员得到学习和进步，他积极支持党部机关开办服务工会和服务学校。寒冬腊月，他亲自督促施工，用不多的开销，建造了一个澡堂，解决了机关工作人员洗热水澡的问题。他身为常委，月薪仅八十元，仍退回了大学教授的高额薪金。他的兼职很多，从不领取兼薪，工作却不计份内份外，绝不谋取私利。他经常告诫家属：“现在是革命政府，今后大家都要注意革除旧的恶习，树立新风尚，不可随便向人有所请托，或答应别人的请托。”

在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领导下，北伐军控制和影响的地区的工农群众运动空前高涨，而伪装革命的蒋介石也就更加按捺不住地加紧了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势力的勾结，准备出卖革命。就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的四月五日，何羽道在省党部的会议上，和大家议决通过了“请中央开除蒋介石党籍”的决定。“四·一二”上海大屠杀后，武汉地区的形势日益紧张，预示着白色恐怖即将来临，武汉政府内部

日趋动摇分化。由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右派人士的不断斗争，于四月十六日成立了武汉市政府，他和苏兆征、吴德峰、向忠发、詹大悲、张国恩、李国喧等人被举为委员。在重大问题上，何羽道态度明朗、旗帜鲜明地支持共产党人的意见，反对国民党右翼的分裂阴谋。国民党右翼竭力对他进行拉拢，汪精卫多次派人许愿，他不为所动，却在共产党面临危难的时刻，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六月七日，他主持召开了武汉三镇国民党党员大会，领导通过了“讨伐蒋介石”、“慰劳前方将士”、“反对帝国主义出兵华北”等通电。七月十一日，武汉已是黑云压城，蒋汪合流、明目分共迫在眉睫，他出面主持了“任剑若烈士追悼大会”。这些不合时宜的危险举动，引起了她母亲的无穷忧虑。老人为了促他离开武汉，不惜向人下跪请托说：“你是翼人平日最相信的人，我请求你劝劝他离开这里吧！他上有老母，下有儿、孙，这样顶下去实在叫人担心。”来进言的人请他出国暂避，并表示愿为代筹费用，但他却说：“革命并没有失败。要继续干革命，总得有人流血，牺牲也是本分。”他把全家迁回家乡，宣布退出省党部和市政府，留在武汉坚持斗争。党的“八·七”会议，决定一些知名的革命知识分子出国，以避免牺牲。当董必武、钱介磐等人反复动员他去日本暂避时，他则表示要与他们一起，同舟共济，匡救时艰。

十一月底，桂系西征军到汉。杀人魔王胡宗铎就任武汉卫戍司令，提出“宁可错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的口号，大开杀戒。十二月十七日，捕捉著名人士李汉俊和国民党左派詹大悲，连夜枪决。不久，与何羽道一起匿居汉口日租界的董必武被盯梢。为安全转移起见，他坚决不同意一起走的主张，一再催促董必武先行离汉，他却在事后为胡宗铎的宪兵所捕捉。湖北清乡督、会办胡宗铎和陶钧对他进行了会审，重施酷刑。他以“挺挺忠臣节，